

药王山北朝碑石研究

编者 李 改 张光薄



陕西旅游出版社
药王山管理局

药王山北朝碑石研究

陕西旅游出版社

2945

63

327

药王山北朝碑石研究

编者 李 改 张光溥



陕西旅游出版社
药王山管理局



(陕)新登字 012 号

药王山北朝碑石研究

李改 张光溥 编

陕西旅游出版社出版发行

(西安长安路 32 号)

新华书店经销 耀县鸿达印务公司印刷

850×1168 毫米 16 开本 8.5 印张 4 插页 165 千字

1999 年 10 月第 1 版 1999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1—3000

ISBN7-5418-1656-6/J·397

定价:精装本 68 元 平装本 52 元

新平知聲
PDG

《药王山北朝碑石研究》编委会

主任委员:王广民

副主任委员:李 改

委 员:张光溥 孙晓峰 肖高社

主 编:李 改 张光溥

北朝金石真品在中華樂山
馬曉題



高俠 西安碑林博物館館長

戈富新を

姚伯多造像の又「魏文朗造像」にみる
仏教と彫刻の芸術上の融合についての論は
書道と芸術についての論述と発表するとは
大変嬉しく、又内容に敬意を表します。
北魏の書は大変素晴らしく魅力的です。
李改先生の増々の書発展と健康を
心より祈念申し上げます。

李改様

一九九八年

松尾右翠

“姚伯多造像”和“魏文朗造像”是佛教艺术同雕刻艺术高度融合的产物。本人对其内容甚感兴趣，欲发表有关的书法论文。北魏的书法的确具有很高的魅力（价值）。祝李改先生事业发展，身体健康！

松尾右翠
一九九八年立春

〔日本国总合书芸院评议员〕



陕西省考古研究所名誉所长石兴邦(中)同作者合影

李改, 又名晓峰, 一九三六年十一月生, 陕西耀县人。药王山博物馆馆员。一九五五年原毕业于陕西省富平师范, 在耀县西街小学任教。一九五六年先后在陕西省委党校进修哲学、政治经济学、中共党史三年。一九五九年先后任耀县小丘公社宣传部部长、行政办公室主任、副书记、书记等职。一九七〇年先后任耀县中学党支部书记。一九八九年任药王山风景名胜区管理处主任、药王山博物馆馆长等职。重视研究药王山碑刻, 先后在中国文物报、中国旅游报、陕西日报、西安晚报发表《魏文朗造像碑》、《姚伯多造像碑》、《毛遐造像碑》、《张僧妙法师碑》、《宋徽宗瘦金体碑》、《龟蛇碑》等十多篇论文。本人处世信条是: “不为富贵重情义, 敦厚待人坚守信, 欲结天下同仁志, 共度书海乐无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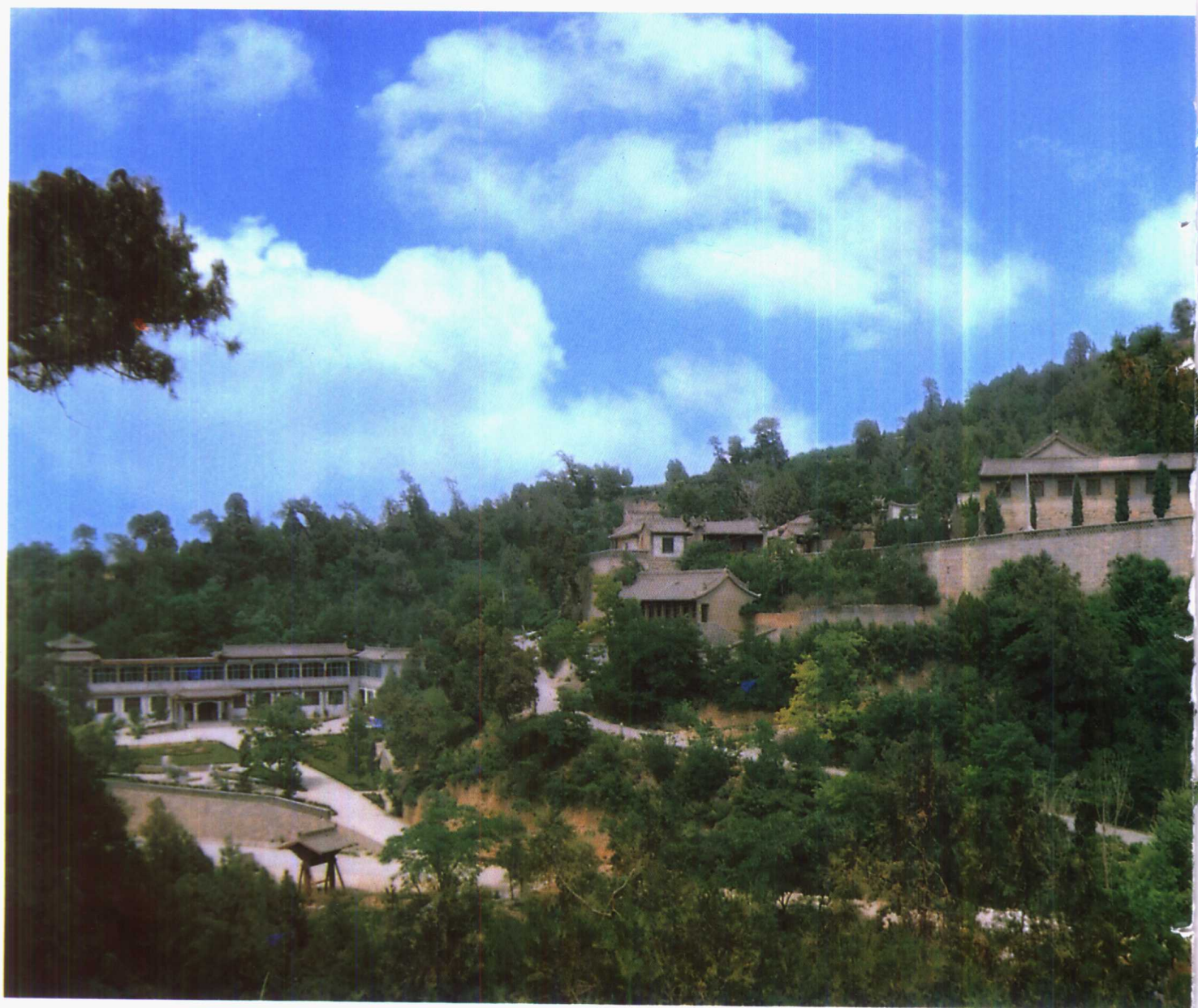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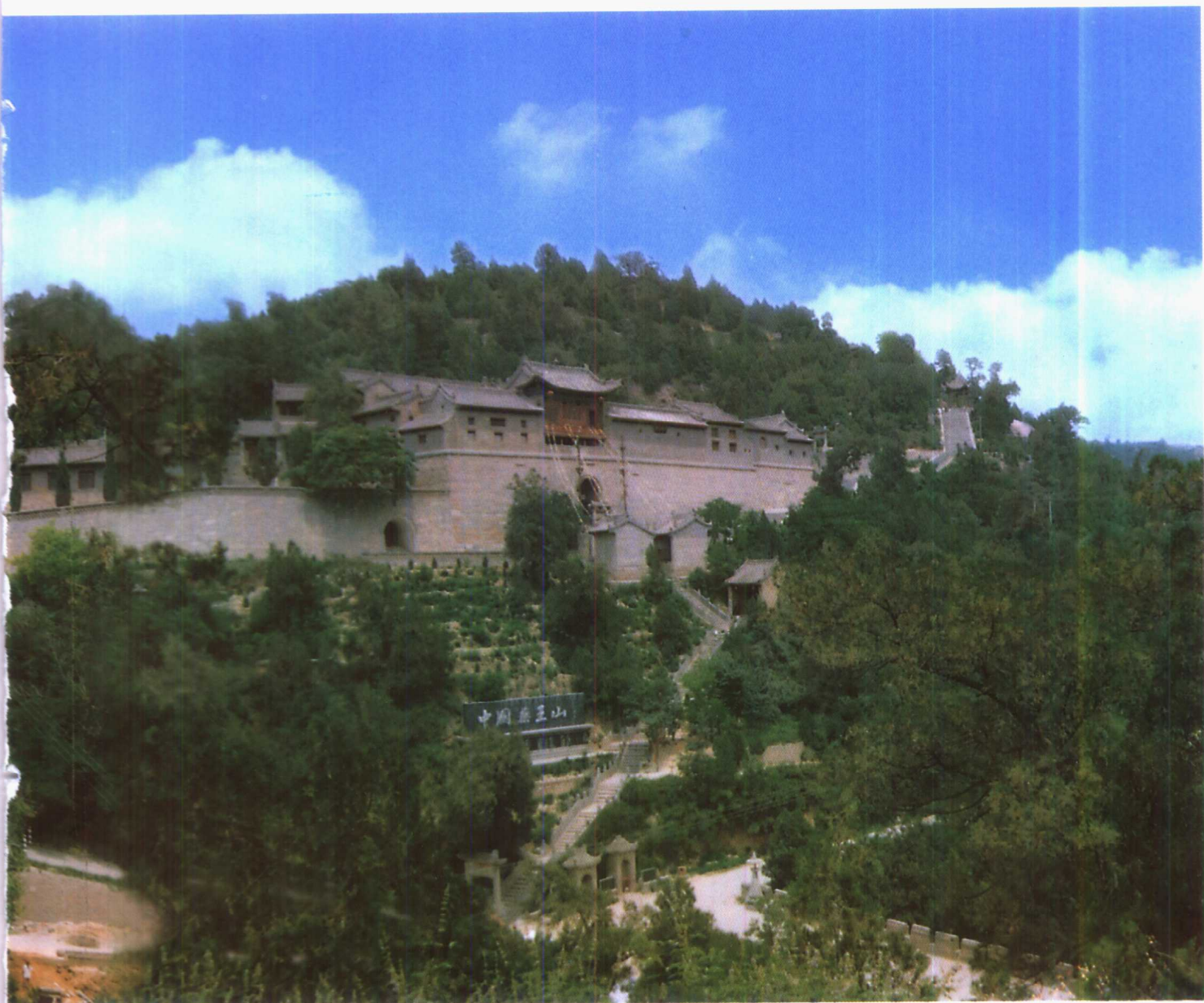
作者简介



张光涛, 字广照, 号山木。一九三二年生, 陕西耀县人。曾就读于陕西省立三原中学。一九四九年八月参加工作, 一九五一年元月加入中国共产党。从事小学教育、职工教育、党校教育工作多年。多次在陕西省委党校攻读马、列、毛泽东思想。曾任党校教员、中小学政治理论教员、小丘公社文卫部长、县文教局副局长及下高埭等乡党委书记之职, 由县卫生局局长职务退休。热心于老龄事业并致力于宣传研究药王孙思邈, 开发药王山, 考究耀县石刻。其间, 担任县老龄委副主任、孙思邈研究社副社长等职。编辑有《药王山书法集锦》、《药王山楹联选》、《药王养生之道》及《保健益寿》等册子。编有《药王魂》大型秦腔剧本, 并组织编导了《药王故里》、《药王山胜揽》、《耀州社火》、《照金烽火》等电视片。爱好养花, 任中国风景园林学会耀县学会副理事长, 被县文化教育局聘请为绿化义务顾问。

药王山北洞







药王山碑林一角

《药王山北朝碑石研究》序

石兴邦

耀县药王山，以山峦峻秀，形胜优美而成佛道庙观胜迹，自隋唐而还，这里以祠祀药王孙思邈并收藏佛道碑石及摩岩造像而闻名于世，积时日久，蔚为大观。现在是陕西地区除西安碑林外，第二个最丰富的碑刻摩岩造像集群保存点址，计有碑石雕刻，摩岩造像数百余通座，其中摩岩造像有佛教、道教、佛道合壁造像三类，以北朝和隋唐时期为主，均被第列为全国第一批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是研究佛、道教文化艺术的宝库，在国内外相关学术研究领域，占有重要的地位。历来研究以探其蕴蓄与价值者，不乏博学之士，均著有成就。

1999年7月，原药王山博物馆付馆长张世英先生来西安。送给我他自己新近出版的几本有关研究药王山孙思邈文化的著作，看到他的成果，我十分高兴。他受前馆长李改先生的委托，要我为他们将药王山北朝石碑，研究整理，写成的专著，写一篇序文，这消息使我更加兴奋。李改和张光溥同志这部新著，是研究药王山文化宝藏的最新一部成果，诚堪嘉许。我们耀县这个地方，在历史上是名人荟萃之地，曾出了一些有名的文化名人。近世在衰微一段时期后，终于有后学继起，以承先贤之遗绪，担负起弘扬文化之重责，怎不叫人奋臂！对药王山珍藏的这批国宝文物，说实话，我没有什么研究，但将它编写成书，传之寰宇，公之学界，以为世用之意念情愫，则心怀已久而未曾稍懈，因之我就慨然应命，诚为之序云：

（一）

在未谈及正题之前，在允许我叙说一下，我对药王山的传奇神感，这是很难抑制的乡梓情缘。

提起药王山，我不是在学考古以后才知道它，而是在孩提时代，就是我向往的圣域之一。所以谈起药王山，不由得就勾起了我少年时代的记忆。记得七八岁时，每年二月二，就随大人步行五十华里，从我的石柱家乡到药王山去烧香赶会，听大人讲广为传布的药王为人治病的那些神奇传说故事，并看到眼前这种人山人海的热闹场景和芸芸众生那种如痴入迷的社会百态，使我的幼小心灵沉浸于奇妙而神异的幻觉之中，久久难以消失。随着年事的增長，知识层级的提高，才从这种幻觉中解脱出来。始知道药王不是神，而是耀县古代乡贤中，在医药学上，有贡献的历史文化名人。保存在药王山上的碑碣刻石，则是从北朝起就积累而留下的宗教文化史迹，有些与药王有关，有些则是在其早期或在其影响下形成的，有着重要的史料价值，素为学界所重视。

这批文化史迹（包括石刻造像）于六十年代初，国务院就公布为第一批重点文物保护单位。1961年我回陕西省考古所工作时，就把发掘整理研究黄堡耀州窑遗址和药王山刻石造像和碑石列为要作的两件大事。前者已按计划逐步实施，成绩颇著，而药王山研究则几度启动而至今未能全璧。

回忆起来，六十年代首先研究药王山石窟和碑石的是韩伟和宋伯胤先生，他们是研究这批

国宝的国内第一人。且有成就,我到考古所不久,韩伟首先交给我他研究药王山碑石和造像的编著,我很高兴,也支持他的这一主动行动和工作。按当时的规矩和一般工作程序,先要征得当地主管部门的同意。我乃将韩伟的著作寄到耀县文教局征求意见(包括对书稿的学术意见)以尊重他们的权益,于情于理都是合适的,但这个意愿,一直没有得到耀县文教局的反应。大约一年后,我将文章要回来,他们也未签署意见,差不多与此同时,《文物》杂志发表了宋伯胤先生写的《药王山文物研究》一文,比韩伟的文章简略一些,但主要和重要的部分都包括在内。这样,韩伟的著作就不好发表了。众所周知,在六十年代的中后期,社教、文化大革命等一系列社会运动,考古所也与碑林博物馆和省文管会合并办公,工作处于半停顿状态,自然无暇研究药王山了。

改革开放后,考古所重新展开工作,1984年我二次回到陕西,负责陕西考古工作,重新提出整理编写药王山考古文化遗存。当时张燕在考古所工作,她对研究石窟,碑石很有志趣,我提出由韩伟和张燕合作与耀县药王山博物馆同志一起进行这一工作,作为对前期研究工作的后续。张燕是个有事业心的青年,当时他正单入独已到陕北一带调查石窟等文物,能吃苦耐劳,有创劲和干劲。她要自己单独进行。审视当时情况,我同意了她的意见。并和耀县政府和主管部门协商,取得共识、共同合作,研究这一课题:决定由陕西省考古研究所和耀县药王山博物馆合作编写“药王山石窟碑石研究报告”。考古所由张燕参加,药王山派业务骨干参加,一同合作进行。李改同志是当时耀县工作的负责人和主要参与者。考古所拨了专款,博物馆给予充分的后勤支援,使这一工作进展顺利,用了两年多些时间就全部完成。这是药王山文物史迹全面系统的研究报告(包括新出土的有关材料),在学术上很有地位和价值。报告完成后,我向张燕说了我的愿望:这本报告要包括三篇序言、一篇是总的意旨和情况,由我来写,另两篇是韩伟和宋伯胤各写一篇研究的感受和对史迹的评估,使陕西学者(陕籍和陕西工作的)研究成果都包含在内,不仅是学术资料的汇集,也是研究智慧的聚萃,就算划了一个阶段性研究的句号。由于出版经费落不实,至今还在社会上游逸。

1996年,张燕将药王山所藏北朝的14通碑石造像和临潼博物馆的4通北魏碑石合起来。编成“北朝佛道造像碑精选”一册面世,由天津古籍出版社刊行,她并写了概括性的研究前言。这样药王山的部分北朝碑石正式公布于世,这在韩、宋两先生编著中有揭示,为世所知,可惜仍未全璧、憾事。因此,李改和张光溥同志这部著作的出版,就觉得特别宝贵。

(二)

李改和张光溥同志编著这部药王山所藏北朝石刻造像碑是对这批文物继韩伟、宋伯胤和张燕三先生之后的第四次研究,也是全面系统的研究,带有集大成的性质和地位。

作者是个好古敏以求之的学人,自他们踏进药王山文化领域后,就沉浸于乡土文物的浓郁气氛之中,醉心于探索它的内涵奥秘。基于强烈的事业心和历史责任感,便从事于药王山及其与药王山有关文物史料的搜索、收藏、保管和整理研究工作。并对馆藏碑石资料作了一翻整理研究,数十年来,孜孜不懈,勤恳耕耘作出了硕硕成果,最近他们从62通碑石中将驰誉中外、蜚声学坛而有特殊历史价值的24通北朝碑石,编著成册,公诸于世,这是研究药王山北朝碑石最

系统的一部专著,也是嘉惠学林的一件德举。也是耀县乡梓学者对这批文物的第一部研究专著。它的问世,必将对迪启后学,策励来兹有激扬开创之功,诚可庆喜。

作者所收录的这批北朝碑石造像的时空界段为关中地区(特别是渭北、耀县三原一带)从魏太武帝始光元年(424年)到北周,建德二年(573年)的150年间所形成的碑石资料,全部著录并加以考释。他们对每一块碑石都下了功力,从形制、内涵、装饰之特点和意境都作了诠释,读者可从每一通碑石的标题中,就可窥见作者探奥入微之功和殚精竭虑之劳。对碑石之标述:或以碑石之形体,或以书法之神韵或以内涵之蕴蓄,或以装饰之神态,或以历史称谓、或以宗教族系,均得名实相印而表述之,既切贴而又符合实际。

作者在介绍碑石的社会功能和总体意识时,是从唯物史观的角度,把碑石文物当成一定历史行程过程中形成的历史事物和证迹来对待的,他们对碑石产生的时代背景和演变过程作了扼要的论述,并对其所揭载的宗教组织,社会结构,民族系属及相互关系以及碑文的书体特点和艺术演变及在中国书法史上的地位和影响等,都作了历史地、辩证地论述,从一个侧面反映出在北朝时期,关中地区数十年间社会历史的真实图象,也显示出这批文物的史料价值和艺术光辉。

一、作者在综述北朝碑石本身的特点时,首先扼要地也中肯地阐明了,中国碑石在这个转型期间的形制特点及其发展规律,及各个层面的内涵及所代表的图形含义:

1、作者从形制学的理念出发,将当时的碑石分为圭形、梯形、方柱形和长方形四类,恰当地排出了碑石形制发展演变过程,为北朝作为中国碑石定型时代的实证,他们还对方柱形造像碑的特点及其装饰图象和建筑风格所蕴含的意境作了叙述、全盘托出当时奉祀娱神观的全部图景,颇有时代特点。

2、作者根据造像碑上人物造型及服饰等特点将其演化过程分作三个阶段:早期是粗犷奔放、单调而庄重的风格;中期则线条繁复浓密,形制精美而细致;晚期笔法简洁轻快,造型规范,线条流畅。这三个阶段,概括了全部流变过程、体现了发展的规律性。他们还特别提出了乐舞百戏图的出现,为社会百像和写实艺术增添了新的内容,带有浓厚的乡土情结和地方性特点。

3、作者对碑文的书法艺术(发愿文和题记)作了较多的论述,根据当时书体流复,“百花齐放、修短奇正熟练”的情况,拈其要者,分作五种书体:即一为方圆互用,拙雅成趣的自然派;二是拙朴无华、歪邪有趣的‘孩儿体’;三是古朴庄重,清晰雄浑的魏书风格;四是柔中含刚,书体秀美的隶楷体;五是笔力健重,宽绰大方的楷书体。这五类可视为书体从隶到楷的全部演变过程,认为北朝书体这种楷中存隶,质朴雄浑的风格及其向楷书体形成,是中国书法史上一次大胆的创新和尝试的结果,有不可磨灭的功绩和意义。

作者进一步对药王山碑石的书体在中国书法史上的地位,作了申述:药王山北朝碑石的书体是北朝书体的集粹之一,是北碑典型的代表,其拙朴自然、开拓放任的特点与其拙朴的造像风格相辉映,富有民间书体风格,有其独特的地方特点,由于其体例介于隶楷之间,处于汉隶和唐楷的转化阶段,有其书法发展的规律特点,所以它是中国书法史上一个承前启后、继往创新的一个重要阶段,其中确多名噪书坛的佳构,素为书学界所珍视。

二、在论及这批碑石的重要历史地位和学术、艺术价值时,作者作了较充分的讨论,这批碑石,虽然只有 24 通,但内涵都是丰富而珍贵的,就其类属而言,它是宗教文化的载体。但北朝时期是中国历史上的特别重要的转折时期,是从十六国分裂局面逐渐到隋唐统一的过渡阶段,而且它就形成于当时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宗教派流兴衰交替,民族杂居融合、政权不断更迭的关中地区。因此,这批碑石就显得更有意义,它所涵盖的不仅是宗教意蕴,而涉及到当时民族、政权与宗教互相制约又相互依附的“错综复杂”的历史关系。

鉴于它的内涵反映出这种多元结构的复杂状况。我想离题,多说几句。

我们中华民族这个大家庭,自古以来就是一个泱泱大国,既是多民族共和的现实大国,也是多宗教汇聚的精神世界的王国。从国家体制来说,叫多元一体格局,即“众多民族在这个熔炉里融合而成统一的凝固的实体。而与此实体相附托的精神文化的宗教世界里,则是多教派共聚一起的形态和模式。在现实社会里,儒、佛、教三教,广谱地渗透到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儒家是以实现社会的伦理观为主导思想的人世型哲学为导向。道家是从中国本土古代巫教的蜕变中发生、并以中华原始朴素的宇宙观为思想基础而发展起来的,在中华沃土有较深的根基。佛教则是外来的,以东方超现实的理念,以拯救现实世界为导向的世出哲学为衣钵。这三大教派,随政治形势之变化而有兴衰。但儒家始终占居主导地位,居通都大邑以庙堂之尊而为世则。佛、道两家则分据宗教界坛,随现实世界之社会政治之变化而分合散聚,或和谐相处,或相互对立,北朝时期,则是政教离合聚散的典型时期。它所反映的社会历史问题约有下列诸端:

1、反映了宗教流派(佛、道)的融合与斗争的政治背景和社会实质。

以药王山为基地的渭北中部地区,自晋而后是佛教盛行的地区,据统计,自晋代的妙德禅院起至北周时的崇庆寺,仅耀县附近寺院就有十六处之多,而且规模宏大,僧尼众多,极一时之盛。道教的流布区在汉中,东汉末年,其宗主张鲁降曹向北迁关中,于是道教在关中兴起,并依附于当时皇室。这时佛、道二教,互相渗透,相关并存,以求发展,道教势力尚小,乃依佛教之公众形象,仿模佛教营窟造像之尊,以扩大其影响,其特点是外以佛教之形体而内实道教之实质,其像多营龕穹雕造老尊,天尊像为主,形似当时士大夫形象,有浓厚的世俗性,在服饰上带有佛像中之特征。其后天尊像以手持尘尾与羽扇为标准的道家形象为特征,在后期的佛、道合龕造像碑中则佛道并龕,互为辅主。其最大的特点是碑头为龕楣及装饰,下半为供养人群像和图像,在太武灭佛后,出现了碑体以发愿文为主体的道碑。魏文朗佛道合龕造像碑是其典型事例。

随着政治形势的变化,佛道两教由和平相处而互相制约以至斗争。北魏时,道士受到皇帝和豪宗大族的宠幸和信奉,在政治上占有了有利地位,始得以发展。其后,天师道宗师寇谦之,起而进行宗教改革,以儒家祀法充实内容,以佛家戒律及建筑模式,取儒释之长以补自己之不足,乃整饰道规,增订戒律,重视诵经,斋醮规范,乃符宗教仪规,以争取皇权重视。其意旨在于以宗教之名,而行政治斗争之实,终于得到皇权垂青而取得政治上的主动权。终于在太武帝太平真君七年(446 年)下令灭佛、佛教受到很大打击。这是宗教势力借政治权力以图发展的典型事例。文成帝即位后,又恢复了佛教活动。关中便成为佛道并行的宗教世界。随着政权的宽容,使两个对立斗争的教派,恢复了和谐,共同为皇权效力,佛道合龕造像碑多出在这个时期。到北

周武帝时,两教的矛盾又激化起来,经过多次公开的经论辩论,道家的楼观台派得了势。周武帝看到两教之间的争斗,对社会稳定的危害。乃于建德三年(574年)下令同时断排佛、道两教,北朝时期二次灭佛,一次排道,使佛教受到很大损害,促使这次灭佛之议的楼观派起了很大作用。楼观教派是以周至楼观台为中心道场而发展起来的道教主流派,创建于北魏而盛于北周,其教领多为关中人,故可称为关中教派。在我看来,当时两教的斗争,其深层底蕴是以道教为依托的地主势力,依借皇权力量,以对抗外教及外族势力,以维持本地权益的一种斗争方式。在佛教的“三武之祸”中,仅北朝就有两次,在仅仅一百二十年间就发生大的反复两次,且是在民族斗争、政治斗争和宗教斗争相扭结而进行的,可见其问题的复杂与斗争之剧烈了。当然,佛道两教虽然时争时和,但相并争斗并能继续发展于当世,基于当时社会的现实感而发生的。战乱频仍,政权更迭民不聊生,广大生众处于水深火热之中,为求解脱病苦,寻求乐土,故以宗教行为,表示对现实的抗争。这种反现实的表现,在造像碑上都有反映,到后期其表示尤重于现实生活的各个层面,一直到隋唐统一为止。

2、反映了当时关中地区民族杂居与种族融合情况。

魏晋南北朝时期,是中国历史上民族大融合时期。表现为西北和东北民族的内徙与汉族杂居相铸,这种内徙浪潮,从东汉末到三国时期即已开始。其后汉室衰微、群雄并起,边疆民族,趁机渗入,聚族而居,与汉族杂处,相互融合。当时东北诸族(匈奴、鲜卑)多驻足山西河北,进入关中的部族以氐羌为主。内徙各族,纷纷建立国家,各自为雄。氐羌种族符姚二大种姓,以长安为都建立了前秦和后秦二个国家,后秦姚氏即莫基于渭北三原耀县一带,北魏姚伯多家族即其后裔。

(1)氐、羌两族原为国源,氐人因业农而从羌人中分化出来,受汉人文化影响较深,学习汉文化模式,诸族中以氐人为势力最大,共建立了三个国家,即符秦、后凉(吕氏)和仇池(杨氏),杨氏仇池因偏处西隅(甘肃成县)享国最长,从196年到552年,长达365年。后为西魏所灭。杨氏家族繁昌,留于史籍的名人也多,在药王山造像碑中,杨氏家族多造道教碑和佛道合龕碑,如杨阿绍,杨缦黑和杨洪义等都是,看来他们倾向于道教的,氐人仿汉人习俗采用同族异姓婚制,在造像碑上也表现的很突出。也有不同民族之间通婚的,汉人娶羌人、匈奴人娶汉人或羌人为妻者也所在多有,从刘文朗道教造像碑上:可以看出刘为汉人或匈奴人,其妻姚氏则为羌人。氐人和汉人通婚的更多。氐人汉化程度深,姓多为单姓,如王、吴、仇等,羌人则是复姓多如荔非,钳耳、弥姐等。

(2)从造像碑供养人的组成和形式,反映出当时迁入诸胡的氏族部落制度和道教的地方组织形式。氐羌诸族,移居中原,初期仍保留原来的部落体制,迁入后,受汉人社会文化影响,逐渐有所改变,也形成家族,宗族的组织形式,信仰宗教顶礼膜拜也是举家举族的集群行为。造像碑上可分出两类:一类是家族造像碑,举家人合造一个碑,这种数量最多,占一半以上,第二类是宗教结邑造像碑,如冯神育佛道造像碑。这种组织的特点是以社区为单元,在一个社区内,一个或几个家族,一村或几个村落,信仰相同的人组织起来成一邑,称社邑,全社邑共立一个造像碑。

结邑造像的人数多少不一,以社邑的大小而异,一般 30—80 人,最多可达 250 人,其出现在碑上的以同宗同性的大家族为主体,如镡双胡碑中镡氏居主(占 88%),冯神育碑中,冯氏占主(49%)。民间的宗教结社是松散的群众组织,多为道教组织,其称谓有道士、道女、侍者等名号。分组类别有(1)妇女结邑;异姓妇女(包括嫁入本族的外族妇女)共奉一碑,还有(2)诸姓合造一碑,各姓占 20—30%,这种造像碑以汉人地区或汉人与氐羌混居集邑为多,从这些碑上所显示的情况,可以看出当时氐羌诸族聚族为邑,而汉人则与诸胡杂居。这也是民族融合逐渐涵化为一体的时代特征。

(三)

作者在编写过程中,也发现了一些新的问题:有的是碑碣发展过程中的奇特形体,有些是人物造型中的独特形象,为雷汉仁造像碑中天尊图像的夸张形态和象征生殖崇拜与权力表征的崇拜物在造像碑上出现的真正寓意,还有娱乐场面的出现等,都是值得进一步探索、研讨的问题,这与当时人们意识形态,生活习俗,甚至群落族系都有深层连系。只要用心研索总会找到蛛丝马迹。

从上面一系列论述,可以概括地认识到,北朝这批碑石,蕴蓄着丰富的历史内涵,本书的功绩,初步揭示出这一宝藏所显示的重要史料价值,将为今后继续工作打下基础和创造了前提。作者作了很有意义的一件工作,为我省和耀县地区的文化建设作出了贡献,提供了策励来兹的一个范例,因为药王山的文物是大量的,还有北朝以后及摩岩造像等瑰宝,还需我们整理研究,我希望耀县和全省从事这方面研究的朋友,能追迹他们的步履和踏出的道路,和他们一起百尺竿头再进一步,把先民留下的文化遗产,创造性地整理研究弘扬出去,就算尽到我们历史职责,是为序。

一九九九年八月二十四日

前言

耀县位于陕西省关中地区北部,距西安七十六公里。古代为北地和北雍地所辖。以唐代伟大医药学家孙思邈而冠名的药王山,于县城东一点五公里。海拔八百一十二米,山势高而不险,卑而不夷,西南俯漆沮二水,东北依将军、宝鉴两山。山尽古柏苍翠参天,犹如龙凤蔽荫,云中庙宇错落耸立,曲径石阶通幽。山势宏伟,绿郁葱葱。风景秀雅,文物荟萃。内藏汉、北魏、西魏、北周、隋、唐、宋、元、明、清及民国历代石碑二百三十余通,摩崖造像四十五尊,佛、道圆雕造像及石牌坊、石塔五十余座。一九六一年被列为第一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真可谓:华原聚宝通鑑石林立,磬玉镶珠国粹碑永垂!

药王山碑石的搜集始于清末年间。先前,一些有识之士,以县境内和寺院、漆河之旁收集的各种古碑六十三通,竖立城内西仓,命名为:“耀县碑林”。五十年代,又从各地收集到二十余通,共八十三通,放置县文化馆。七十年代,移迁至药王山大殿之东侧。后继续收集到二十余通,均藏碑林未展。

药王山碑石的存量,次于西安碑林,北朝造像碑是国内收藏最多之地,其中佛、道融合造像碑居全国之首。《魏文朗造像碑》(424年),为北魏佛道融合造像碑之始。造像碑之多是由于:耀县在北朝时期是佛教活跃,道教扩张的地区之一,汉族和少数民族杂居融合。耀县造像碑最早最多,不仅与统治阶层占据地域有关,而且,同佛道斗争史实相一致(请参阅附录:范文澜著《中国通史》“北朝的文化”一节摘录)。当地盛产磬玉石也提供了上等的造碑材料。

药王山北朝造像碑,由于年代久远和残失等因,只存碑身居多,唯有一通北魏“青龙

造像碑”首、身、座俱在,能观其原貌。碑大体是呈长方形。碑石内容,丰富多彩。上开龕饰楣和造像,中刻供养人和题名,下为发愿文和两侧图案。龕形楣饰,百花齐放,人物造像,生动逼真,其风格和山西云岗、河南龙门大同小异,由北魏初期雕刻粗犷、面容消瘦的“秀骨清像”,趋于后期面相方圆、体态健壮方面转向。服饰由繁缛密集向衣纹宽疏简洁而过渡,造像逐步向中国化、世俗化和写实性发展。这些造像碑对研究我国宗教史的演变具有重要的意义。构图精美,雕刻娴熟。龕楣上刻有不同类型的纹饰,并用线刻浅浮雕的手法,表现出日月星辰,升龙飞天,仙禽神兽,经变故事的立体感,构成一幅美丽的天人感应祥瑞图。同时,还刻有简洁质朴的车马出行图,乐午百戏、杂技表演等地区写实性的内容。这些丰富的艺术作品为我们进一步发掘和研究北朝时期的社会经济、政治、文化艺术提供了珍贵而有价值的资料。书法艺术,耐人寻味。碑石大部分榜题为发愿文和资助立碑供养人姓名。《张僧妙法师碑》有颂德人的姓名、籍贯、生平经历及家族世系的简况。这些石碑,不仅记载了北朝宗教、民族、经济、文化发展的历史背景,同时,也留下了古代劳动人民,用智慧之手,书写出粗拙质朴、天真有趣的宝贵书法艺术作品。

汇编这部集子,是抛砖引玉,有待于专家学者继续探索其内涵,在历史悠久的我国艺术宝库灿烂之花中,吸取营养,创造出自己更新的各种艺术作品和风格。